

# 文人·才子·师友

——追思忆明珠先生

■徐兆淮

2017年10月25日清晨，久卧病榻的他驾鹤西去了。作为我的老作者、老邻居、老师友，我虽然获知他住院后，曾连续三次去医院探望，或点头问候，或作短暂交谈，如今他的离世，仍让我长久沉潜于悲痛之中，难以自控。

他就是诗文俱佳的才子、有情有义的文人、年逾九十岁的忆明珠先生。虽然，离世前，他曾立下遗嘱，叮嘱家人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但我仍会长久地追思他，怀念他老人家。听说，他的家乡青岛文史馆即将要为他举办诗文书画展，我以为，这真是适时之事。

作为《钟山》的老编辑，我自然十分感谢忆老屡次为期刊惠赐佳作，为杂志赢得了读者和文学界更好的声誉。据我记忆，从1984年至1994年十年间，忆老曾连续在《钟山》刊发六篇散文小品，其中首篇《个园话竹》即荣获《钟山》优秀散文奖。

1927年出生于山东莱阳书香世家的忆明珠，本就有着特殊的创作经历。他三十岁时已写诗多年，直到五十多岁时，才开始主要转向散文小品创作。及至六十五岁，他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荣获全国优秀作品奖时，又封笔诗文，主要转向书画创作，且很快就在文艺界赢得了诗文书画俱佳的美誉。

在《钟山》刊发的《个园话竹》，最能体现忆老早期散文的特色。这篇随笔式的写景散文，以诗一般语言，借助于对扬州名园个园景色描述所涉及关于竹的人文典故，表达宣泄的，却全然是作者个人的性灵与情怀。难怪此文刊发后不久，即铭刻于园林之内，吸引了众多游览者的目光。

作为读者和评论爱好者，我更看重的，还是忆老作为诗文书画俱佳的才子型作家的美誉。盖



2002年前后，忆明珠先生（中）、文学评论家黄毓璜（右）与本文作者合影。

因在我看来，考之当代文学史，真正能荣获此等美誉的才子型作家，实在太少。即说巴（金）老（舍）曹（禺）吧，他们在诗文领域的成就与声誉，自然远非忆老可比，但论及书法和绘画，就很少有人知晓了。至于成长在新社会的工农作家，往往由于在文化艺术修养上的欠缺，或因各种条件所困，则更难达到诗文书画俱佳境界。

可喜的是，放眼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界，已可看到不少中青年作家，正在为提高文艺修养改善昔日诗文书画方面的欠缺而努力。于是，我方始能听到有当代“中国四才子书系”（汪曾祺、忆明珠、冯骥才、贾平凹）和中国名老头之说。而在这四人中，显然，汪老和忆老堪为领军人物。难怪提到文坛才子向来就有“北有汪曾祺，南有忆明珠”之

说了。更为可喜的是，近几年，文坛正有更多的青少年作家朝着这个方向积聚力量，扎扎实实地为提高文学修养，创作出更高水平的作品而努力前行。

像忆老这样五十岁前后以诗文出名，七老八十岁后又以诗文书画俱佳而闻名于世的才子型作家，本足以令人羡慕和向往了。事实上，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文艺出版社争向忆老约稿，并已出版十多本诗文书画集。可一向淡泊名利，从不跟风趋势、求红争宠的忆老偏偏于2005年出版了一本《不肯红的花》。书中忆老开宗明义地坦露了他创作诗文书画的心态：“江山事业、金钱美女，统统不属于我，我所拥有的，就是眼前的这个‘老’字。除‘老’而外，一无所有，勉强看来，像是属于我的，只

有手中这支笔了！”

或许正如忆老所言：“我好不容易老了！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到老了，可该让我翘起尾巴做文了！”观之忆老一生为人经历，诚如其常说之语：“淡泊明志，淡泊如水。像我这样的人，即便肯红，红得起来吗？”忆老实可谓对社会对自己看得十分透彻清醒，难怪只有他这样的长者才会发出“潇洒老一回”的感慨了。

当然，无论如何，迟开的花总比不开为好，迟到的荣誉与认可，总比埋没文坛委屈终身要好得多。忆老一生从来不争名争利，荣辱不惊，清白为人，淡泊为文，实可谓在人间潇洒走一回了。难怪著名评论家黄毓璜先生生前在忆老书画集《抱叶居小品》序言中写道：“忆明珠现象，不说奇观，也就算得一道异样的风景了。”“以

‘雕虫留痕’、‘画边留吟’、‘水墨留趣’，集成《抱叶居小品》，留下的正是那种不拘一格而不绝如缕的生命意绪和世情风味。”

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忆老这朵昔日不能红不肯红的花终于还是红了，而且红得惹人注目，引人深思。作为他的编辑，作为他的读者和评论爱好者，我当为之高兴为之点赞。作为他的邻居，作为他的小辈文友，我仍不免有意犹未尽之感。如今，在忆老离世之际，倘若我光谈对他为文的评价，避开对他为人的印象，尤其是不谈他是个有情有义、重情守义的文人，我便不免有愧对忆老之憾。

在不肯红和已经红之间，在老来诗文书画俱佳被视为“当代四才子”之时，忆老之家已常有宾客盈门之喜。不管认识的或是陌生的来访者，忆老夫妇尽力满足，待人接物可谓有情有义，热情慷慨。

在我看来，忆老对社会对时代，对人心世情的理解，本是足够清晰明智的，他平时很少议论时政，在单位里也从不与人争执什么，但这一切并不表明他不食人间烟火，更不表明他是一个不辨是非回避矛盾的和事佬，和遇到矛盾绕开去的懦夫。

忆老走了，却给文苑留下了让人难忘的文化遗产，精美的《忆明珠文集》和《小天地庐漫笔》《不肯红的花》，还有《抱叶居小品》及他为文友所写的序言。最后还为仪征文化馆留下了诗文书画作品。

忆老走了，我常站在自家客厅里，凝视墙壁上悬挂的忆老为我题写的匾额，那匾上书法题写的，正是他喜爱的郑板桥的诗句。

忆老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忆老的诗文书画，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相信，忆老及其诗文书画，也会镌刻在江苏甚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上接第一版）

## 翻译中的舍与得

莫楷表示，自己在翻译过程中会遵守与作者的信任关系，尽量忠实于原文，但同时他认为，确有创作能力比作者更强的译者。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再创作，翻译家有权力加重译文的色彩和感染力，据说托尔斯泰的英文译本就比原作流畅得多。文学翻译的目标是一种共同创作（co-creation），以谦虚的心态进行的翻译不会阻碍原作的再次传播。

翻译过程中使用的附文本主要包括序言、注释（包括脚注和尾注，一般情况下，脚注简单，尾注详明）。虽然莫楷本人对脚注没有异议，也不认为会妨碍读者阅读，但是如今对脚注的排斥已成为西方翻译家的普遍心态。在个人翻译实践中，莫楷会尽可能减少脚注，他认为注释过多不但会破坏文章的节奏和韵律，更糟糕的是，阅读极易成为读书备考，故事的沁人性被破坏。因此他更惯用尾注，这样既不干扰阅读过程，又可在正文后畅怀挥笔。在翻译何其芳的《画梦录》时，莫楷几乎一律用尾注，将正文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典故和历史材料在正文后全部铺开，以致85页的正文后，竟有50页的尾注。

莫楷认为，译本是译者与出版社互相

角力的产物。基于受众和市场效果的考虑，出版社为了实现接受效果的最大化，往往会向编辑和译者施加压力；而编辑和译者则以论点的合理性与个人审美价值为据不愿轻易屈从与让步，译本在一次次争锋中产生并获得意义。令人庆幸的是，许多编辑、译者和出版人的合作是建立在友情之上，他们往往是商业界最讲情义和彼此信任者。以编辑与译者关系为例，前者的影响力不仅限于译作，更有可能波及至译者整个职业生涯。编辑应视译者同原作者，亲密无间。译者则视编辑为友，忠诚有加——纵使其他出版商开价更高，仍不为所动。当然，他们之间的友情维护有其基本原则：编辑不会为译者而损害出版社利益，毁了自己的事业。当译者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强调话语权时，编辑多以大局为重，当机立断。毕竟译作一旦出版，盈利与否，编辑全权负责。

对任何文本的修改权都应该保留在与文本最亲密接触的人之手。原作者和译者交流，译者和编辑交流均是如此。基于个人文学理论背景，莫楷对翻译的理解并不墨守成规，他认为“作者意图”这个概念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而言，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都难以截然区分。当译本进入修改阶段，交流要以译者为主。为了让译文情节更紧凑，表达更富韵味，有些原本细节会被“轻描淡写”，会被“创造

性地处理”，会被调整顺序，甚至做部分删减。成功的译作未必是完美之“对译”。符合源语语境审美期待的译文未必能在目的语阅读市场取得成功。同样，虽然翻译编辑是译本的“主刀医生”，可对译本进行“手术”，但必须遵循的原则是“不要制造伤害”，即整个编辑过程需尽量保持译者的语言和思想。

观念差异属于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中文作家的某些表达有时会触碰到英语读者的神经，这种情况下，编辑和译者都非常谨慎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比如，莫言一代的作家经常在对女性或黑人的描述中流露出己见，出版社和翻译必须想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 双管齐下：提升质量、尊重受众

莫楷认为，为了达到更广的覆盖面与更好的接受效果，除了图书出版以外，中国文学还可以通过报纸连载、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方式进行传播，但无论如何，提高作品质量才是关键。在美国，《解密》《狼图腾》并未热销，《三体》却一夜“倾城”。这一成就一半归功于刘慈欣的原创能力，另一半则得益于刘宇昆和Joel Martinson的佳译。原本和译本的双面高质才会使国外出版社编辑主动出价，竞购该书版权。需要指出的是，以《三体》为代表

的类型文学一直比纯文学市场大得多，更容易寻找到对此感兴趣的编辑和愿意巨额投资的出版社。

艺术的创造、阅读与欣赏是人类有史以来不可或缺的行为，跨文化的艺术交流由文化发展内力自驱完成。莫楷认为，文学作品以保持意义的多元化为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会受限于一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有限的知识储备，对作品和翻译过度的干预会使文本趋向意义和解释的统一化。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按照传播者的价值观念把传播者和接受者理解为主动体和被动体，这是对受众阅读权利的轻视。有吸引力的作品，接受者自会主动索要；缺乏吸引力的，传播者再推亦无用。文学几乎没有“走出去”的，只有被“请出来”或者“被挖出来”的。要真正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必须尊重受众，以受众为主动体。《西游记》英译本有塞缪尔片段的节译本《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詹姆斯·韦尔短篇翻译的《中国的仙境》、蒂莫西·理查德长篇翻译的《圣僧天国之行》、海伦·M·赫斯的更长篇幅的一百回选译本《佛国天路历程：西游记》和最有影响力的韦利全译本《猴王》，相关组织需要做的是支持尽可能多样的译本出版，以供不同受众选择，并为其提供必要的辅助性支持。